

國家發展研究 第十四卷第一期
2014 年 12 月 頁 1-32

民主化的社會經濟基礎

公民抗爭運動的跨國實證研究*

傅恆德**

收稿日期：2014 年 4 月 2 日

接受日期：2014 年 9 月 23 日

* DOI:10.6164/JNDS.14-1-1。作者感謝兩位匿名的審查委員所提供的寶貴修正意見，使本文更具有可讀性。至於資料與數字的詮釋若有不妥，文責全歸作者。

**現任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E-mail: hdfu@thu.edu.tw。

摘 要

在民主化第三波中，有許多國家成功地轉型，但僅有部份能持續民主發展。革命難，改革更難；民主化不易，民主深化更不易。這些過渡到民主的國家在何種情況和條件下，公民抗爭運動有較高的機會深化民主？本研究以 20 世紀後期 64 個經由人民抗爭運動推翻的威權統治國家，討論民主轉型前和轉型過程中的社會經濟基礎，及其後續民主鞏固的狀態。研究發現以非暴力的行動，成功地推翻威權統治者，有較高的機會深化民主。同時，在轉型期間過多的行使暴力抗爭，將減少了民主深化的機會。經濟發展程度則間接地影響了民主的深化。

關鍵詞：民主化、社會經濟基礎、非暴力公民聯盟、抗爭運動暴力

壹、前言

在政治發展各項議題的討論中，有關民主與民主轉型一直占有核心的重要地位。在民主化第三波中，有許多國家成功地轉型成為民主政治，Fukuyama (1996：20-37) 指出這是民主生活方式的勝利，是歷史的終結。然而隨著第三波的回潮，僅有部份國家持續民主化。¹ 這使研究者對政治民主化與民主鞏固的「條件說」更有興趣（李佩珊，2001：5-7），是否真的有門檻或先決條件？從全球民主化長期的觀察中發現，即使在少數時段上有些微的停頓或回潮，隨著現代化的腳步，民主化仍持續進展。² 換句話說，由於民主政體強調自由主義，保障民權並維護人權仍是一種比較好的政治體制，也使得許多人民抗爭運動在各地對抗威權統治，以爭取更多的權利和自由。人民於是走上街頭，以和平或暴力的抗爭，推翻威權或集權統治。

在 21 世紀初，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的人民抗議行動，使學術社群與媒體輿論關注民主化第四波是否正式啟動了。³ 然而，當突尼

¹ 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 2008 年的調查報告指出，相較於 2007 年，在總體自由民主程度出現明顯倒退跡象。選舉的民主國家（electoral democracies），在 2010 年跌到剩下 114 個，比 2006 年少了 7 個，是自 1994 年以來最低的數量。<http://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15>。檢索日期：2013 年 1 月 15 日。

² 根據自由之家的資料，在 2013 年有 46%（89/195）為自由國家，與近十年的平均數相同。但就整體發展而言，1970～1979 年的自由國家平均為 32%；1980～1989 年為 34%；1990～1999 年為 41%；請參見“Freedom in the World 2011: The Authoritarian Challenge to Democracy”，<http://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15>。檢索日期：2013 年 10 月 15 日。

³ 阿拉伯之春指的是突尼西亞（Tunisia）、埃及（Egypt）及利比亞（Libya）。顏色革命指的是喬治亞（Georgia）的玫瑰革命（2003），烏克蘭（Ukraine）的橘色革命（2004），及吉爾吉斯（Kyrgyzstan）的鬱金香革命（2005）。吳玉山（2007：67-112）在顏色革命的許諾與侷限中指出，三者在本質上既非革命也未落實民主。

西亞（Tunisia）和埃及（Egypt）才慶祝推翻威權統治的結束時，更艱難的民主轉型任務才剛要開始。在 2011 年初，埃及才剛慶祝民主的勝利，年底民眾又走上街頭。2012 年民選的總統上台後，2013 年人民又走上街頭要總統下台，導致軍人以政變接手政權。革命難，改革更難；民主化不易，民主深化更不易。在民主化第三波之中，有一些國家順利過渡到民主，但另一些國家則退回威權統治，為何民主會倒退？有些國家很幸運的在轉型過程中，沒有太多的暴力衝突；但有些國家則在轉型期間伴隨著高度的暴力衝突，其社會經濟的基礎為何？由於轉型的社會必須重新彌補衝突的傷痕，這些以暴力衝突完成的轉型，對民主化有什麼負面的影響呢？

本研究以 20 世紀後期的近三十年間（1973～2000），64 個經由人民抗爭運動推翻的威權統治國家為例，討論民主化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基礎。除了收集這些國家的社會經濟資料，並以自由之家每年的調查資料和世界銀行的發展報告為基礎，進行跨國研究分析。本研究嘗試探討在何種情況和條件下，人民抗爭運動有較高的機會深化民主？是否強且富凝聚力的反對團體採取非暴力的方式推翻政權，有較高的民主化程度？當反政府的人民團體形成，為何有些革命行動採取和平示威，有些卻採取暴力行動？本文在第二部份為理論與文獻檢討，檢視重要的討論與研究發現。第三部份提出一個完整的研究設計，包括研究架構、研究方法、及主要變數的觀察與操作。第四部份為資

同時，根據自由之家的報告，2012 年喬治亞的平均為 3.0，烏克蘭的平均是 3.5，吉爾吉斯則為 5.0。三國都是半自由，只是在程度上有差異。相對於 2011 年，喬治亞從 3.5 進步到 3.0，烏克蘭從 3.0 退到 3.5，吉爾吉斯則仍為 5.0。詳見 Diamond (2000), "The End of the Third Waves and the Start of the Fourth." In Narz, F. Plattner and Espada, J.C, (eds.), *The Democratic Invention*. pp 13-33.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甘逸驊（2007）。〈失色的『顏色革命』？〉，《臺灣民主季刊》4(1): 217-220；李西潭（2011）。〈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啟動了嗎？〉，《新世紀智庫論壇》53: 88-99。

料分析與研究發現，指出經濟發展，政治暴力及民主化三者間的關係。最後在結論中指出研究的政策建議。

貳、理論與文獻檢討

民主化既不同質，也不是單向不回頭的過程。隨著三波的民主化，民主國家的總數增加了，但也隨著回潮，有些民主國家回復到威權。從整體的民主發展觀察，有些國家持續威權統治；有些國家反覆地在自由與不自由的路上徘徊；但也有一些國家在民主化後順利地維持民主鞏固。這引發我們對於民主轉型與民主化的原因、過程及結果的研究動機。是否在民主轉型之初，特定條件就已決定了轉型後是否能持續的民主化？以下分由社會及經濟條件和民主化，民主轉型與民主化兩層面分別討論：

一、民主化的社會及經濟條件

Lipset (1981) 認為經濟成長是民主發展的社會先決條件，Dahl (1971) 也有類似的看法，但也有學者表示不同的意見，Rustow (1970) 指出不能因為民主國家都有較高的經濟發展，就將其認為是民主化的門檻或條件。然而經濟發展和資源分配的平均，有助於民主的成立也是不爭的事實（Huntington, 1984: 193-218）。當然經濟發展程度不是一天造成的，有賴於長期經濟的持續成長。當經濟發展到某一個階段時，就有利於民主政治的成立和維持（Nguyen, 2004）。民主政治是否能在開發中國家實行的爭論，也有圍繞在文化或價值的先決條件，如在固有文化中強調容忍、重視理性思辨、社會個人需求的平衡、權利和義務並重的觀念等。他們主張民主的先決條件有經濟的條件、文化價值、以及開放多元的社會體系等。然而反對者主張文化是不會缺乏，只有程度上略遜；文化和價值是會變的，先決條件不會以整體形

態出現，而是以個別出現。事實上，開發中國家仍有實行民主政治，經濟不是條件，領導階層實行民主政治的決心，民主憲政和法治的基本觀念之確立才是成功的關鍵。

民主化程度和經濟發展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學者有主張威權國家成長較快的說法。他們認為民主化程度較低的威權政府有較大的裁量權訂定強而有效率的政策，如強制縮減消費以增加投資以便快速的成長，故常可以有快速的成長（Andreski, 1969；Berger, 1976；Chiot, 1977；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反之，保障政治自由，鼓勵結社的民主制度自然會產生更多「分配性聯盟」，使非生產性轉移增加。經濟活動的沒有效率，使成長緩慢，進而阻礙民主政治的持續發展（Buchanan *et al.*, 1980；Tollison, 1982；Weede, 1982；Przeworski *et al.*, 1997）。針對 138 個國家，從 1950～1990 的資料分析中指出，經濟發展的程度並沒有影響民主轉型的機會，但使民主政治較為穩定。但 Boix and Stokes (2003) 則指出經濟成長會影響並使非民主的國家民主化。Kennedy (2010) 從 178 個國家，自 1816～2004 年間的資料分析，發現經濟發展降低主要制度改革的機率，但增加民主化的機率。Boix (2011) 在稍後的研究再次地維持原來的主張，強調經濟發展對民主化有正向但遞減的效果。在二次戰後的世界體系中，也有助於民主的鞏固。從以上經濟發展的水準與經濟成長的角度討論民主化，似乎有不同的發現與解釋，其問題可能不是涵蓋時間的長短或資料的統計分析方式，而是模型設定的問題。若研究模型的設定不同，經濟發展因素和民主化的關係，自然會有不同甚至於相反的結論。因此本文假設經濟因素和民主化之間有中介或控制變數。

從現代化理論、依賴理論、發展理論和國家的角色來探討民主政治和經濟發展的關係，傅恆德（1998）發現民主化程度與均富有正面的關係，新興的民主政治與均富沒有顯著的關係，而威權政體雖較為不均，但並未有顯著較低的均富指數。在整理討論學者研究發現後，

郭承天、吳煥偉（1997）指出，經濟發展與民主化沒有直接確定的關係，經濟發展對民主政體的建立沒有確定的影響，但是經濟發展對民主化程度和民主鞏固則有顯著的影響。總之，經濟因素和民主的關係相當複雜；快速的成長使得開發中國家增加了民主化的基礎，但也造成不安定；而開發中國家實施民主政治因成長緩慢，人民因政府的無效能，而支持回復到威權。這也間接印證了民主政治與經濟成長並沒有顯著的關係（Weede, 1984）。基於上述論點，如果經濟發展和民主化有關，可能是經由政治安定與再分配。長期的成長使再分配變為可能，在適當的再分配政策下，才有較為平均的社會。Huntington (1984) 因此主張民主的先決條件是高度的發展和平均的分配。也因此 Muller (1988) 便指出當威權國家經歷了一段較長的成長後實施再分配，建造了均富的社會，使民主鞏固變成可能。不然，就進入了所謂的惡性循環（vicious cycle）。快速成長造成不均與過多的政治參與，不安定威脅了民主的建立，使得限制參與的威權政府的興起（Huntington and Nelson, 1976）。

除了資源分配平均外，社會的文化條件也是考量的重點。社會分歧是基於地區、種族、語言、宗教、政治理念的分歧等因素，而分離意識則是一種心理狀態。當國內有次級團體或特定種族主張較大的自主權時，分歧的社會有較高的機會產生分離意識。陳美慈（2004）在族群分化與公共財之提供一文中指出，族群分化愈高的國家因為資源使用的沒有效率、政府政策效能低落等問題，進而造成經濟成長緩慢。至於社會分歧與政治暴力的關係，傅恆德（1993）實證的研究也指出分歧的社會有較高的機會產生暴力衝突，有中等程度的相關。由於學者主張民主的先決條件有文化價值和開放多元的社會體系等，教育水準也成為重要指標。張芳全（2003）便指出教育可促使人民政治社會化、教養出更好的市民、有更高的公民態度、及政治價值。這些看法呼應現代化理論者的主張，也指出教育普及與民主

有關聯性。

二、民主轉型與民主化

民主化的進程並不全是一步到位，就轉型成民主國家。在實證的觀察中發現，有許多國家經雙反轉測試後，才鞏固民主，但也有許多國家的民主轉型，只是由極權進步到威權，或由威權進步到半威權。因此民主化指的是轉型前、轉型、及轉型後等三個階段。不論一個國家的民主化程度的現況為何，比較轉型的前後，就可以看出持續民主化的程度。由此可知民主轉型是民主化過程中結構和制度的變化，而民主鞏固則是在轉型後的一般狀態。因此就許多學者而言，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指的是成功的轉型和持續性的民主運作（*Linz and Stepan, 1996*），是一種特定的條件如雙反轉（*two turnovers*）（*Huntington, 1991*；*Przeworski, 1995*；*Gunther et al., 1995*），或是一種客觀的狀態（*Mainwaring, 1992*；*Linz and Stepan, 1996*）。Valenzuela (1990) 指出有五個條件影響民主鞏固：(1) 民主轉型的方式和威權政府的菁英對民主原則的態度；(2) 政權的比較，歷史的記憶，及正當性；(3) 衝突的緩和；(4) 衝突的處理；以及 (5) 軍隊受民主政府管制。Adcock (2005) 的個案研究中，也證實衝突和暴力阻礙了阿爾及利亞、哥倫比亞和瓜地馬拉的民主鞏固。而李佩珊（2001）更進一步地指出了民主鞏固的政治與經濟基礎，並認為影響民主鞏固的關鍵在於新政體的經濟治理能力與經濟表現。⁴

上述學者指出的條件項目如轉型前的政治與經濟基礎，或是轉型到民主後的民主鞏固和政體表現，但較少討論轉型的過程是如何影響

⁴ 文中指出有關民主鞏固的研究多半側重舊政體的崩解過程、新憲政秩序的形成、族群政治與國家認同、新舊政黨間的重組與結盟、以及選舉制度等基本遊戲規則的重新界定等。

到後續的民主化。在 2006 年，自由之家研究團隊曾對 20 世紀末期的民主轉型國家進行深入的探討，並有初步的發現。Karatnycky and Ackerman 指出轉型過程中，反政府的公民聯盟（civic coalition）的組織與行動，對持續的民主化也有決定性的影響（2006）。在轉型期間，有強且有凝聚力的非暴力（powerful and cohesive nonviolent）公民聯盟採取非暴力抗爭有 75% 的國家可以維持自由民主。若轉型期間是由顯著的市民抗議和動員所驅動，有 64% 的國家可以得到較多的自由。反之，若是由權力當局（power holders）從上而下的轉型則較少，只有 21% 維持自由。當強且有凝聚力的非暴力公民聯盟形成，在革命的過程中不使用暴力（或很少的暴力），則幾乎一致性地維持高水準的自由。即使在顯著的鎮壓或高程度的暴力情境，有 12 國的反對團體仍不採取暴力對抗，也有較高的機會維持民主，其中 7 個為自由，5 個為部份自由（2006：6-9）。Karatnycky and Ackerman (2006: 10-14) 指出當威權倒下後，許多國家無法建立民主政體，主要是因為缺乏強且富凝聚力的公民聯盟。因此建議聯合國、跨國組織或各國的政府，應以外交或其他壓力減少威權政府的內部鎮壓，以創造市民組織聯盟。同時，國際組織應幫助形成中的公民聯盟，在其先期成立時就給予協助，尤其是非暴力市民抗爭的行動策略與技術。

雖然 Karatnycky and Ackerman 的研究橫跨 34 年（1972～2005），討論了 67 個國家的政體轉型，是一個相當完整且有政策性的研究。但這個研究有三個明顯的研究缺失：首先是模型不夠完整。以非暴力的公民聯盟，趨動力、暴力的來源、和暴力的程度等四個變數，並沒有控制其他的社會經濟變數，難以建立因果關係。其次是主要的變數的操作化不佳。四個主要的自變數間有高度的相關，也重覆地解釋了部份現象。況且依變數僅以 2004 年當年的自由程度資料，看不出長期的變動。雖然 2004 年的民主自由指標也約略有代表性，但為次序變數（自由、部份自由和不自由），無法看出細微變化。第三是資料

的分析不夠深入。研究結果的呈現主要以描述為主，並以列聯表和百分比的作比較分析。雖有控制部份變項，但仍未扣除重覆解釋的部份，也無法建立因果關係。因此本研究除了改進上述問題外，並指出一個完整的研究架構，期能由一個完整的研究得到深入的解釋。

參、研究設計

根據自由之家的整理，在 20 世紀末有 67 個國家經由群眾運動推翻舊政權。由於 Bosnia、Cambodia 及 Panama 等三個國家，在民主轉型中有明顯的外力干預，故不納入本研究中。⁵ 在這 64 個國家中，有 41 個國家在轉型後有一些進步，22 個國家沒有進步。只有 Iran 在革命後，民主是倒退的，在革命前是半自由，革命後是不自由。在 43 個進步的國家中，Argentina 等 14 個民主國家在轉型前是不自由，但轉型後是自由，也就是說有大幅地進步，請見下表 1。

這些轉型後為自由的國家中，有半數是前共產國家在民主化第三波，隨著蘇聯的解體而民主化，如 Bulgaria、Estonia、Latvia、Lithuania、Mongolia、Slovakia、Romania 等。另有 Brazil 等 17 個國家由部份自由過渡到自由，其中包括亞洲四小龍的台灣與南韓。包括 Albania 在內的 10 個國家，則由不自由進步到半自由。約有三分之一的國家在轉型後仍維持現狀，Azerbaijan 等 9 國在轉型前後均為不自由；Bangladesh 等 13 國轉型前後均為部份自由，也就是在民主程度上沒有進步。為了更仔細地討論持續民主化的原因，本研究提出研究架構，並指出主要變數的測量方式與資料來源，以利後續的分析與討論。

⁵ Karatnycky and Ackerman (2006) 指出三個國家有外力干預 (significant external intervention)，Bosnia 由不自由轉型到部份自由；Cambodia 維持不自由；Panama 從不自由轉型到自由。

2013 自由的類別	不自由 (not free)	部分自由 (partly free)
不自由 (not free)	Azerbaijan 1988, Ethiopia 1990, Kazakhstan 1988, Russia 1988, Uzbekistan 1988, Belarus 1988, Gambia 2000, Mali 1990, Tajikistan 1988, Zimbabwe 1975, (n=10)	Iran 1978 (n=1)
部份自由 (partly free)	Albania 1989, Bolivia 1982, Malawi 1991, Mozambique 1991, Paraguay 1988, Armenia 1988, Kyrgyzstan 1988, Moldova 1988, Nigeria 1997, Tanzania 1993, (n=10)	Bangladesh 1989, Macedonia 1989, Mexico 1999, Nicaragua 1989, Thailand 1991, Uganda 1984, Guatemala 1995, Madagascar 1989, Nepal 1989, Philippines 1985, Turkey 1980, Zambia 1989, (n=12)
自由 (free)	Argentina 1981, Bulgaria 1988, Estonia 1988, Indonesia 1997, Lithuania 1988, Portugal 1973, Slovakia 1988, Benin 1989, Czech Rep. 1987, Greece 1973, Latvia 1988, Mongolia 1989, Romania 1988, S. Africa 1989, (n=14)	Brazil 1984, Chile 1987, El Salvador 1991, Guyana 1989, Peru 1999, Senegal 1999, Slovenia 1989, Spain 1974, Uruguay 1983, Cape Verde 1990, Croatia 1998, Ghana 1999, Hungary 1988, Poland 1988, Serbia-Mont. 1999, S. Korea 1986, Taiwan 1991, (n=17)

本研究針對革命前的社會基礎和革命過程中的重要機制，建構了整體模型。主要的假設是社會的結構和基礎條件間接地影響民主化，而人民的行動和組織則是直接影響後續民主化的主因，模型的建構也是依據這樣的邏輯。從時間的順序來看，社會結構和經濟基礎的變數如分配平均、經濟發展、教育程度、社會分歧是比較長期的因素。這

些結構性因素，透過人民的抗爭行動如暴力行動影響了民主的深化，模型設定如下圖 1。由於轉型前的民主化程度是一個先在的條件，所以也將轉型前的民主化水準為控制變項。總之，非暴力的公民聯盟和轉型期間暴力的使用與否，在控制轉型前的民主化水準下，是否對後續民主化有獨立且非虛假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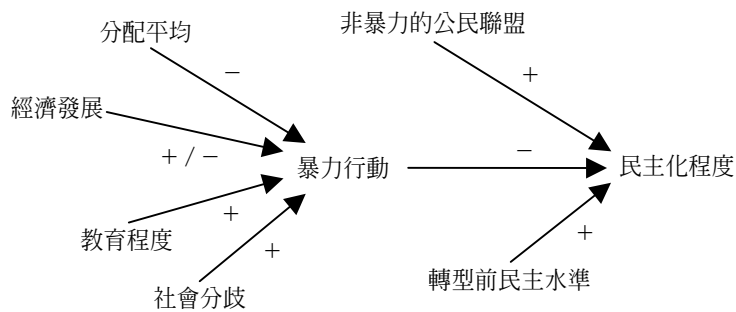


圖 1 研究架構

二、主要變數的觀察與操作

本研究中所指的轉型、轉型點和轉型期的操作化定義是根據 Karatnycky and Ackerman (2006)。轉型是指政體由一黨專政到多黨制；從威權統治到民主統治；從君王統治到市民統治；從一黨獨霸到多黨民主；或是從後衝突政體的改變；或是從國家分裂後所產生的新國家。而轉型點則是指當國家行政領導更換，選出新領導產生或修訂新憲法之日，或是在後衝突的決定局面確定時。至於轉型期間指的是轉型點回溯的前兩年期間（Karatnycky and Ackerman, 2006: 47）。

（一）民主化

本研究的主要依變項為民主化的水準，因此指標的選擇就很重要。由於民主是個多面向的概念，任何單一指標都無法妥適地測量。由於自由之家的指標是由政治權力（political rights）和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 所構成，且自 1972 年以來都有持續性的調查資料，是最適當的依據。⁶ 依自由之家的評分，最自由是 1，最不自由是 7。再分成三類，當市民自由和政治權力平均為 1 至 2.5 則歸類為自由；3 至 5 為部份自由，5.5 至 7 為不自由。⁷ 相對而言，七分類的評分比三類型的歸類詳細；而長期的觀察比特定一年的觀察周延。因此，本研究的民主化變數使用自由之家最新的 2013 年資料（資料涵蓋至 2012 年）。概念的操作是將轉型後到 2012 年間加總，再取其平均分數，作為民主化指標。如此可以增進民主化的測量，除了可以增進測量的品質外，也不會因為歸類（自由、部份自由、不自由）而喪失資訊。本研究樣本的民主化指標最高為 6.59，最低為 1.26，平均數為 3.07。

(二) 轉型前民主程度

如同民主化指標，為了更仔細地觀察轉型前的一般狀況，本變數使用自由之家最新的 2013 年資料，從轉型當年開始，回溯加總到 1972 年間，後再取其平均分數，作為轉型前民主化程度指標。由於轉型前的民主化程度會影響到轉型後的民主化程度，因此在整體模型中，加上本指標以作為控制變項之一。研究樣本的轉型前民主程度指標最高為 7，最低為 2.94，平均數為 5.42。

(三) 非暴力公民聯盟

本變項是依自由之家的分類，在轉型的過程中是否有強且富凝聚力的非暴力公民聯盟產生。自由之家依觀察各國的轉型過程與發展，

⁶ 其中，政治權利包括選舉過程、政治多元與參與、和政府功能與運作；而公民自由則包括表達及信仰自由、團體結社權利、依法統治精神、及個人自主與權利等項目，因此本指標作為民主的觀察是合宜的。

⁷ 見自由之家網站：<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594> 有詳細的評分，檢索日期：2013 年 10 月 15 日。

而分別標以強（strong）、中（moderate）、弱或沒有（weak or absent）等三類，用以指出轉型過程中的公民聯盟強度。⁸ 所謂強指的是，在轉型期間有一個強而有力且有凝聚力的公民聯盟採非暴力行動進行抗爭；中指的是，有相當強的會員支持，但聯盟因不夠團結而減弱其力量、或有部份成員主張暴力抗爭、或有些市民組織並未顯著地得到大眾的支持。至於弱指的是，沒有顯著的公民聯盟，甚至沒有最起碼的民眾支持（2006：48）。本研究延用自由之家的指標，其中有 32 個國家是歸類於強；18 個國家為中等；另外 14 個國家為弱或沒有，如 Cape Verde、El Salvador、Ethiopia、Gambia、Guatemala、Kazakhstan、Kyrgyzstan、Macedonia、Mozambique、Paraguay、Tajikistan、Uruguay 和 Zimbabwe 等。

（四）暴力程度

本變項採用自由之家的研究團隊 Karatnycky and Ackerman (2006: 47) 等人的分類方式，將轉型過程中所引發的暴力的程度分為四類：高度的暴力，顯著的暴力，大部份無暴力，以及非暴力。⁹ 高度的暴力是觀察到內戰正在進行中、有族群或宗教的衝突導致上千人死亡、或有全國性的軍事行動或政治整肅而導致成千上萬的死亡人數。顯著的暴力是觀察到數十或數百人死亡；大部份無暴力是指只有少數的死亡民眾；非暴力是指在轉型期間並沒有任何傷亡。有些國家在轉型過程中，有高度的使用暴力，如 Argentina、Bolivia、Bosnia、El Salvador 等。也有些國家在轉型過程中沒有使用暴力，如 Belarus、Bulgaria、

⁸ 本項分成三類，並把弱，或者沒有（weak/absent）編碼為 1，中（moderate）和強（strong）則分別編碼為 2 和 3。

⁹ 本項分為高度的暴力（high violence），顯著的暴力（significant violence），大部份無暴力（mostly nonviolent），以及非暴力（nonviolent）等四類，分別依序編碼為 4,3,2,1。

Croatia、Czechoslovak 等。

(五) 社會分歧

由於社會的分歧是最常見的政治衝突原因，因此國家有分歧的社會，在政治暴力的風險愈高。最常見的社會分化指標是族群和語言分化（ethno-linguistic fractionalization, ELF）指標，當指標數字愈大代表分歧愈大，資料來源是 Easterly and Levine (1997)。ELF 指標最先是由蘇聯研究者 Bruk and Apenchenko (1964) 建構並發表在 *Atlas Narodov Mira*，該指標是以一個國家的總人口中，各種族和語言人口的百分比之比例建構而成。這項指標收錄在 Taylor and Jodice 所編著的世界政治與社會指標手冊（*World Handbook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dicators*）第二版（1972）和第三版（1983）中，因此不但廣泛地被使用，也深富有影響力。由於這項指標易於解釋，後續的研究和指標更新，多依這個方式建構並更新。雖然社會的分歧並不只限於種族和語言，宗教的分歧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但由於宗教分歧的遺漏值過多，故不採用。

(六) 教育程度

由於世界各國在基礎教育（primary education）著力較深，在比例上的差異不大；而各國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的資料遺漏值太多，也有許多國家是個位數，變異不大，故選擇進階教育（secondary education）作為測量。以受進階教育人口的百分比來區分教育程度的差異，一方面符合本文的假設，也可以看出教育普及的一般狀況。資料來源是世界銀行每年出版的世界發展報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是以轉型當年受進階教育的百分比來測量。

(七) 經濟發展

由次許多文獻指出經濟發展是民主政治的先在條件，因此經濟發展是民主化的重要的解釋項。經濟發展在本研究中為經濟發展的水準而非經濟成長率，因此使用的是調整相對購買力後的真實的國內平均生產毛額（real GDP per capita, PPP）而非成長率（growth rate）。討論經濟發展和政治暴力的相關文獻指出兩者間有直線或曲線的關係。¹⁰ 經濟發展和政治暴力有直線關係指的是，當經濟發展程度高時，暴力程度愈低，經濟發展程度愈低，政治暴力的程度愈高，兩者為負相關。經濟發展和政治暴力有曲線的關係指的是，當經濟發展程度很高或很低時，政治暴力程度愈低，中間階段的經濟發展程度，則有較高的政治暴力。在本文中，兩者均被提出來檢測，以求其周延。資料的來源是世界銀行每年出版的世界發展報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是以轉型當年的經濟發展水準作測量。¹¹

(八) 分配平均

在政治暴力的相關研究中，不均一直被視為重要變數。「不患寡，患不均」在中外都有相關論述。這些經由社會比較所產生的相對剝奪感，是造成政治暴力的主因之一。由於收入分配的資料不多，在跨國研究的比較上，常因缺乏資料而使研究的樣本減少，因此 Salvatore and Alvarez-Rivadulla (2007) 撰文提出解決方式，他們標準化收入不均的

¹⁰ H. D. Fu 發現在六個五年的區間，經濟發展與政治暴力的關係是呈倒 U 字型的曲線關係（1991）。其所使用的資料來源為 Charles and Jodice (1983)。誠如 Huntington (1968) 指出，政治暴力的產生不是因為窮，而是想要富。因此中收入的發展中國家，相對於最富有或最窮困國家，有較高程度的政治暴力。

¹¹ 若當年無資料，則以其後一年的資料作為替代，但限定在轉型期前後五年內的資料。

資料，也就是說以內插的方式補足了遺漏的資料，這樣的資料恰符合本研究的需求。同時，分配不均是以 GINI index 的方式測量，數字愈大代表愈不平均。

肆、資料分析與詮釋

在文獻檢討中指出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資料的分析不夠仔細，以描述統計為主，以列聯表和百分比的比較為輔，因此本研究進一步以變異數分析作深入的分析。由於非暴力的公民聯盟和暴力的程度是次序變項；轉型趨力和暴力來源是類別變項；故以變異數分析作初步的分析。整體而言，所有的國家在轉型後迄今，平均的民主化程度為 3.07。¹² 在轉型的過程中，有強且富凝聚力的公民聯盟，結果有最佳的自由程度（2.37）。反之，缺乏或只有微弱的公民聯盟的國家，其轉型結果較差（4.24），在 ANOVA 模型中，可以看出平均數有顯著的差異（ $F=13.70, p<.001$ ），請見表 2。

轉型趨動力的模型也是顯著的（ $F=7.16, p<.01$ ），市民驅動有較佳的自由程度，由上而下的轉型則較差。暴力來源和民主化程度也有顯著的關係（ $F=5.75, p<.01$ ），若只有國家採取暴力，則有較佳的自由程度（2.67），若是國家與反對團體均參與暴力者，有較差的民主表現（3.92）。在轉型期間暴力程度愈高，轉型後的民主自由的程度愈低（3.71）；暴力程度愈低，民主自由的程度愈高（2.48），關係是顯著的。

¹² 由於自由之家的評分，最自由是 1，最不自由是 7，所以得分愈小，代表愈自由。

表 2 民主化程度與主要變數的變異數分析表

變 數	組 別				F 與 P 值	雪菲檢定
非暴力的 公民聯盟	全體	弱 / 無	中等	強	F=13.70	1>3
	3.07 (64)	4.24 (14)	3.39 (18)	2.37 (32)	P=0.000***	2>3
轉型趨動力	全體	市民的	混合的	權力當局	F=7.16**	1<3
	3.07 (64)	2.92 (18)	2.67 (32)	4.16 (14)	P=0.002	2<3
暴力來源	全體	國家	國 家 和 反對團體	無或很少	F=5.75**	1<2
	3.07 (64)	2.67 (35)	3.92 (18)	2.92 (11)	P=0.005	
暴力程度	全體	非暴力	大部份 非暴力	高度的暴力	F=2.85*	
	3.07 (64)	2.48 (22)	3.01 (13)	3.71 (11)	P=0.045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說明：數字是民主指標的平均分數，括弧中的數字是國家數。*** $p<.001$ ，** $p<.01$ ，* $p<.05$ 兩尾檢定。

爲了瞭解非暴力的公民聯盟與暴力行動對民主化的影響，對兩變數作交叉分析比對其民主化的程度。整體而言，具有強且富凝聚的公民聯盟的國家（2.37），相對於弱（3.39）或無（4.24），有較佳的民主化程度，如下表 3。在暴力的使用方面，非暴力的行動結果，有較佳的民主表現（2.48），而採取顯著或高度的暴力者，則有較差的民主化成果（3.43 和 3.71）。若是具有強且富凝聚力的公民聯盟採取非暴力的行動，則在後續有較佳的民主表現（1.83），是所有組合中最好的。這項發現與自由之家的初步發現是一致的。惟本研究是依統計檢定並指出的是更細緻的差異。

表 3 公民聯盟的強度和暴力的使用對民主化的影響

暴力程度 非暴力 的公民聯盟	非暴力	大部份 非暴力	有顯著的 暴力	高度的 暴力	全 體
弱 / 無	3.65 (4)	4.73 (3)	4.54 (2)	4.29 (5)	4.24 (14)
中等	2.83 (7)	3.65 (3)	3.69 (6)	4.05 (2)	3.39 (18)
強	1.83 (11)	1.99 (7)	3.06 (10)	2.82 (4)	2.37 (32)
全體	2.48 (22)	3.01 (13)	3.43 (18)	3.71 (11)	3.07 (6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說明：數字是民主化程度，括弧中的數字是國家數。

一、民主化與轉型過程

爲了更深入地討論其間細微的變化，以迴歸分析的方式分析之。由於非暴力的公民聯盟和暴力的程度是次序的變項，故准用連續變數。至於轉型趨力和暴力來源是類別變項，因此各建立兩個虛擬變項。¹³ 首先就個別的變項加以檢視。相對而言，非暴力的公民聯盟，有最佳的解釋力，決定係數 R^2 是 0.31 (表 4 模型 1)。也再次印證了表 2 ANOVA 分析的結果，強而有凝聚力的公民聯盟，採非暴力的行動成功地推翻舊政權，有較佳的民主化程度表現。

由於轉型的趨力和暴力的來源是類別變項，故各建立兩個虛擬變項。轉型趨力設置由下而上市民 (civic) 和由上而下的掌權者 (power holder) 兩項。由上而下的轉型傾向有顯著較低的民主程度 (表 4 模型 2)。在沒有或很少暴力的情況下，也有較高的民主 (模型 3)。至於暴力的程度，隨著暴力程度愈高，有愈低的民主水準 (模型 4)。若加上有強的非暴力公民聯盟，再加上轉型過程中只有少量或沒有暴

¹³ 轉型趨力三個類別中，建立了「市民趨動」和「權力擁有者趨動」；暴力來源三個類別中，建立「來自國家」和「沒有暴力來源」。

力（模型 5 和 6）則有最高的解釋力，決定係數 R^2 是 0.40。¹⁴

表 4 民主自由程度與轉型過程變項的迴歸分析

	1	2	3	4	5	6	7
常數	5.21*** (0.43) <u>12.07</u>	2.67*** (0.22) <u>12.01</u>	3.92*** (0.30) <u>13.06</u>	2.09*** (0.37) <u>5.68</u>	5.59*** (0.80) <u>7.01</u>	5.60*** (0.43) <u>12.96</u>	4.27*** (0.52) <u>8.25</u>
非暴力的 公民聯盟	-0.92*** (0.18) <u>-5.27</u>				-1.17*** (0.31) <u>-3.78</u>	-0.92*** (0.19) <u>-4.84</u>	-0.89*** (0.17) <u>-5.24</u>
轉型趨力		0.24 (0.39)			0.63 (0.35)		
市民的=1		<u>0.66</u>			<u>1.81</u>		
轉型趨力		1.49*** (0.40)			-0.17 (0.57)		
掌權者=1		<u>3.73</u>			<u>-0.30</u>		
暴力來源			-1.00* (0.99)			-0.01 (0.46)	
國家=1			<u>-2.05</u>			<u>-0.02</u>	
暴力來源 沒有或 很少=1			-1.24** (0.37) <u>-3.37</u>			-0.80* (0.33) <u>-2.44</u>	
暴力程度				0.43** (0.15) <u>2.94</u>			0.36** (0.12) <u>2.94</u>
R	0.56	0.44	0.40	0.35	0.59	0.63	0.63
R ²	0.31	0.19	0.16	0.12	0.35	0.40	0.40
N	64	64	64	64	64	64	6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說明：第一個數字是 β 值，括弧中的是標準差，劃底線的是 T 值；*** $p < .001$ ，** $p < .01$ ，* $p < .05$ 兩尾檢定。

¹⁴ 變項為次序變項，以連連續的方式進行迴歸。相同的，暴力的程度也是依相同的方式處理。又由於變數間有高度相關，故未把所有變數都放在同一迴歸方程式中。

二、民主程度與社會經濟因素

爲了進一步瞭解民主程度和社會經濟因素的關係，保留表 4 中最顯著的兩個變數，再控制轉型前的民主化程度後，並將經濟發展水準、收入分配、和教育程度依序納入方程式，以收相互控制之效。在控制非暴力的公民聯盟、暴力程度和轉型前民主程度，所有的經濟的因素都變成不顯著（不管是直線或曲線，表 5 模型 1 和 2）。換句話說，經濟水準並沒有直接影響後來的民主化程度。無獨有偶，社會分歧程度、收入分配和教育程度因素也都不顯著（表 5 模型 3-5）。因此我們可以推斷，社會經濟因素對轉型後的民主化程度沒有顯著的關係或直接的解釋力。去除不顯著的參數，表 5 最後簡潔的模型只有三個變數，其解釋力與其他模型相近（表 5 模型 6）。¹⁵

經由上述的實證資料檢測指出，經濟的條件並沒有直接影響後來的民主化水準。這樣的發現與一般的看法略有些不同，也部份否決了門檻條件說。經濟條件與民主化有關係，但並非因果關係。這也說明爲何學者的發現會有一些差異。較合理的推測是，經濟發展透過中介變數，間接地影響民主化。換句話說，經濟發展水準影響轉型期間暴力的使用的程度，進而再影響後來的民主化水準。因此我們可以假設，特定的社會經濟條件會影響民眾傾向以和平的方式或暴力的方式進行集體抗爭。簡言之，這些經濟的門檻條件，經由轉型過程是否使用暴力，而間接地影響了後來的民主程度。¹⁶

¹⁵ 在最終模型中，影響民主化程度的三個重要變數間相關係數不高，且均爲不顯著，故沒有重覆解釋或共線性的問題。

¹⁶ 至於轉型前社會經濟發展對於非暴力公民聯盟形成是否有影響，經迴歸分析檢測後發現，四個社會經濟發展變數對非暴力公民聯盟的影響是微弱的，不但整體模型不顯著，個別的係數也都不顯著。

表 5 民主自由程度與社會經濟變項的迴歸分析

	1	2	3	4	5	6
常數	3.07* (1.52) <u>2.01</u>	0.73 (5.00) <u>0.15</u>	2.08* (0.96) <u>2.18</u>	1.85 (1.28) <u>1.45</u>	2.34* (1.09) <u>2.15</u>	2.49** (0.92) <u>2.70</u>
非暴力的公民 聯盟	-0.83*** (0.18) <u>-4.67</u>	-0.83*** (0.18) <u>-4.66</u>	-0.80*** (0.16) <u>-5.21</u>	-0.89*** (0.17) <u>-5.42</u>	-0.81*** (0.17) <u>-4.76**</u>	-0.89*** (0.16) <u>-5.43</u>
暴力的程度 (Level of violence)	0.40* (0.14) <u>2.95</u>	0.38* (0.14) <u>2.67</u>	0.37** (0.12) <u>3.05</u>	0.37** (0.18) <u>2.95</u>	0.44 (0.14) <u>3.13</u>	0.40** (0.12) <u>3.37</u>
轉型前民主化 程度	0.33* (0.15) <u>2.18</u>	0.34* (0.15) <u>2.19</u>	0.32* (0.13) <u>2.38</u>	0.37* (0.16) <u>2.32</u>	0.30* (0.15) <u>2.02</u>	0.31* (0.14) <u>2.70</u>
經濟發展水準 (Ln GNP p.c.)	-0.12 (0.14) <u>-0.85</u>	0.62 (1.50) <u>0.41</u>				
經濟發展水準 (Ln GNP p.c. ²)		-0.06 (0.11) <u>-0.49</u>				
社會分歧程度 (ELF)			0.73 (0.49) <u>1.48</u>			
收入分配 (GINI)				1.04 (1.42) <u>0.73</u>		
教育程度 Secondary					-0.002 (0.005) <u>-0.31</u>	
R	0.67	0.67	0.68	0.67	0.68	0.67
R ²	0.45	0.45	0.46	0.45	0.47	0.45
N	60	60	64	64	56	56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說明：相關數字與註記說明如表 4。

三、社會經濟因素與政治暴力

由於社會經濟的條件並沒有影響民主化程度，爲了證明暴力的使用有其社會經濟基礎，我們加入了經濟的因素、社會分歧程度、收入分配和教育程度因素，並使用有序洛基迴歸模型（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檢測之。¹⁷ 經濟的因素對暴力的行使有顯著的影響（表 6 模型 1），隨著經濟發展愈佳，愈傾向不使用暴力。

由於經濟發展的水準和政治暴力的關係，有學者指出是呈倒 U 字型的關係，也就是曲線關係。若是把經濟發展和政治暴力的關係界定爲曲線關係，並加以檢測，發現有較高的解釋力（Pseudo $R^2=0.218$ ）（表 6 模型 2）。這樣的發現，與學者先前的發現是一致的。¹⁸ 也就是說，相對於經濟發展程度較高或較低的國家，中等程度經濟發展的國家有較高的機會使用暴力。社會分歧較高的國家，並沒有顯著地有較多的使用暴力（模型3）。收入愈不均的國家傾向使用較多的暴力（模型 4），解釋力約略有一成多（Pseudo $R^2=0.127$ ）。國家有較高的平均中學教育者，也有較低的機會使用暴力（模型 5），解釋力約略高於收入分配但低於經濟發展程度。整體而言，對暴力程度而言，單項指標都多爲顯著或如預期方向。但是最後在整體模型中（模型 6），除了經濟發展外，單項指標在加入其他變項後，變成不顯著。這意謂者當經濟發展的因素放在迴歸模型中，教育水準、社會分歧、和分配不均與暴力使用的關係成爲虛假的關係，也就是說經濟發展程度就概括

¹⁷ 轉型過程中所引發的暴力的程度分爲高度的暴力，顯著的暴力，大部份無暴力，以及非暴力等四類，在本質上是次序的。若以準連續變項視之，則可以使用一般迴歸（OLS）即可。但由於暴力的使用是依變數，爲了更精準地估計，故以有序洛基迴歸進行統計分析。

¹⁸ 先前的研究是在 1948~77 跨國的資料分析中發現，中等程度的經濟發展國家有較高的政治暴力，低度發展的國家次之，高度發展的國家再次之。（Fu, 1991）

地代表了其他變數。因此開發中國家有較多的暴力，在本研究中可以得到證實。當經濟發展水準愈高，愈傾向不使用暴力；相對於較高或較低的經濟發展國家，中收入的國家也有較高的機會使用暴力進行抗爭。最後，經濟發展因素透過暴力的使用，間接地影響了民主的深化。

表 6 政治暴力程度之有序洛基迴歸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模型

	1	2	3	4	5	6
經濟發展	-0.56* (0.23)	6.94* (2.96)				7.73* (3.19)
經濟發展 2		-0.57* (0.23)				-0.59* (0.24)
社會分歧			1.43 (0.85)			0.42 (1.13)
收入分配				5.49** (2.05)		2.28 (2.89)
教育程度					-0.03** (0.009)	-0.02 (0.02)
截點 1	-4.60** (1.64)	19.26* (9.48)	0.01 (0.48)	1.29 (0.76)	-2.31*** (0.63)	23.44* (10.09)
截點 2	-3.78* (1.61)	20.16* (9.51)	0.87 (0.49)	2.21** (0.79)	-1.39* (0.58)	24.50* (10.14)
截點 3	-2.20 (1.55)	21.84* (9.56)	2.30*** (0.56)	3.70*** (0.88)	0.20 (0.55)	26.25* (10.22)
N	60	60	60	60	56	56
Nagelkerke's Pseudo R ²	0.108	0.218	0.048	0.127	0.175	0.323
Likelihood ratio X ²	173.20	140.39	189.70	175.25	136.00	158.47
-2 Log likelihood	150.63	143.40	169.92	161.97	133.12	131.3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說明：相關數字與註記說明如表 4。

伍、結論

本研究以 20 世紀後期的三十年間，64 個經由人民抗爭運動推翻的威權統治國家為例，討論民主化的社會基礎。收集這些國家在轉型期間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經濟資料進行跨國研究分析。研究發現具有強而富凝聚力的公民聯盟以非暴力的行動，成功地推翻威權統治者，有較高的機會深化民主。同時，在轉型期間，過多的行使暴力抗爭，將減少轉型後民主鞏固的機會。本文同時發現，在特定的經濟條件和重要的社會基礎下，才有較高的機會以和平的方式進行抗爭，並促使民主化。但這些條件，並非直接地影響民主的深化，而是經由中介變項政治暴力，影響了民主的深化。換句話說，社會經濟條件較佳者，常選擇非暴力的方式進行民主轉型，有較高的機會在持續民主化。反之，社會經濟條件較差者，常以暴力的方式推翻政權，結果有較少的機會持續民主化。依本論述的邏輯，經濟門檻條件的論點是可以成立的。若能致力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再進行民主改革，則有較高的機會在轉型後完成民主鞏固。

進一步的推究其原因，發現轉型後的社會必須化解轉型時期的衝突與對立；減緩社會的緊張關係。許多國家在轉型後無法凝聚民主共識，加上軍隊國家化未能落實，也造成鞏固的難題。至於轉型後的政治經濟表現雖非本文主要的討論範圍，但合理的推測是，新政府必須概括承受先前行政團隊所留下的政經難題，在無法因應民眾的期待下作有效的改善時，也是成民主停滯或回潮的主因。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李佩珊（2001）。〈民主鞏固的政治經濟基礎：國家、市場與民主的結構改革〉，《國策專刊》18: 5-7。
- 吳玉山（2007）。〈顏色革命的許諾與侷限〉，《臺灣民主季刊》4(2): 67-112。
- 郭承天、吳煥偉（1997）。〈民主與經濟發展：結合質與量的研究方法〉，《問題與研究》36(9): 75-98。
- 陳美慈（2004）。《族群分化與公共財之提供》，台北：國立政治大學財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芳全（2003）。〈教育指標、經濟指標與政治指標之關聯分析〉，《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學報》16(1): 341-378。
- 傅恆德（1993）。〈政治暴力的剖析：理性抉擇理論〉，《東海大學學報》34 (12): 395-413。
- 傅恆德（1998）。〈民主政治與經濟均富：跨國實證的比較研究〉，《東海大學學報》39(5): 31-52。

二、英文部分

- Andreski, S. (1969). *Parasitism and Subversion*. New York: Schocken.
- Adcock, C. (2005). "Violent Obstacles to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Three Countries: Guatemala, Colombia, and Algeria." In ProQuest CSA Illumina Discovery Guides. <http://www.csa.com/discoveryguides/demo/overview.php>. Retrieval date: 2013/01/19.
- Babones, Salvatore J. and Alvarez-Rivadulla, María José (2007). "Standardized Income Inequality Data for Use in Cross-National

- Research.” *Sociological Inquiry* 77: 3-22.
- Berger, Peter L. (1976). *Pyramids of Sacrifice*.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 Boix, C. (2011).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5: 809-828.
- Boix, C. and Stokes, Susan C. (2003). “Endogenous Democratization.” *World Politics* 55: 517-548.
- Bruk, Salomon I., and Apenchenko, V. S. (1964). *Atlas Narodov Mira*. Moscow: Glavnoe.
- Buchanan, James M., Tollison, Robert D. and Tullock, G. (1980). *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College Station, TX: Texas A. and M. University Press.
- Chirot, D. (1977). *Social Chan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Dahl, R. (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 Opposition*.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Easterly, W. and Levine, R. (1997). “Africa's Growth Tragedy: Policies and Ethnic Divis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 1203-1250.
- Fu, Hung-Der (1991). *Modernization, Repression, and Political Violence*.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Tucson, Arizona: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 Fukuyama, F. (1989).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6: 3-18.
- Gunther, R., Diamandouros, N. P. and Puhle, H. (1995),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84). "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9: 193-218.
- Huntington, Samuel, P. and Nelson, Joan M. (1976). *No Easy Choi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Karatnycky, A. and Ackerman, P. (2006). "How Freedom Is Won: From Civic Resistance to Durable Democracy." *Freedom House*, http://www.freedomhouse.org/uploads/special_report/29.pdf. Retrieval date: 2013/10/15.
- Kennedy, R. (2010). "The Contradiction of Modernization: A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Interpretation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2: 785-798.
- Linz, Juan J. and Stepan, A. (1996). *Problem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 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ipset, Seymour M. (1981). *Political Man. expanded edi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Mainwaring, S. (1992).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Issues." In Scott Mainwaring, Guillermo O'Donnell and Valenzuela, Samuel J. (eds.), *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p. 294-341.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Muller, Edward N. (1988).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 50-68.
- Nguyen, T. T. H. (2004). "Is There a Developmental Threshold for Democracy?: Endogenous Factors in the Democratization of South Korea." In Asian Development Bank & Vietnam Development Forum, *Which Institutions Are Critical to Sustain Long-term Growth in Vietnam?*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 Przeworski, A. (1995). *Sustainable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rzeworski, A., Fernando P. and Limongi N. (1997).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World Politics* 49: 155-183.
- Rustow, Dankwart A. (1970).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2:337-363.
- Salvatore J. B. and. Alvarez-Rivadulla, Maria J. (2007). "Standardized Income Inequality Data for Use in Cross-National Research." *Sociological Inquiry* 1: 3-22.
- Taylor, Charles L. and Jodice, David A. (1972). *World Handbook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dicators*. 2nd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Charles L. and Jodice, David A. (1983). *World Handbook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dicators*. 3rd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ollison, Robert D. (1982). "Rent-Seeking: A Survey." *Kyklos* 35: 575-602.
- Valenzuela, Samuel J. (1990).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Post-Transitional Settings: Notion, Process, and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Working Paper #150, Helen Kellog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Weede, E. (1982). "The Effects of Democracy and Socialist Strength 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23: 151-165.

Weede, E. (1984). "Political Democracy, State Strength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DCs: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0: 297-312.

World Bank. (various years).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various issu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 Socioeconomic Origins of Democratiz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ivil Resistance Movements

*Hung-Der Fu**

Abstract

While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witnessed a historic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democratic states by the late 1980s, the global trend toward democratization suffered setbacks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color revolutions and civil resistance movements in Tunisia and Egypt led to speculation about a possible fourth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Why did some countries successfully consolidate democracy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hile others have failed to do so? What w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s civil resistance movements and democratic durability during this perio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ocial origin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by examining 64 transitional countries with mass civil resistance movements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ates with strong civic coalitions which used nonviolent tactics to overthrow authoritarian rule had a better chance of achieving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States which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violent conflict were less likely to consolidate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unghai University.
E-mail: hdfu@thu.edu.tw

democracy. An important finding of this study is that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did not influence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directly, but had an indirect impact by influencing the likelihood of political violence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Keywords: political violence, nonviolent civic coalition, resistance movement, durable democracy